

从和谐与差异视角看中西文明交流互鉴

文/韩震

百年变局，世界进入动荡变革之中，人类文明走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冲突还是合作？封闭还是交流？相互学习借鉴还是歧视与排斥？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必须回答的世界之问。如何理解文明之间的差异呢？西方的文明冲突论，其立论基础就是差异造成矛盾和冲突，而中国自古以来就主张“和而不同”的交往之道。实际上，按照和而不同的原则，差异不仅不是消极的因素，反而是积极的能动力量。一般说来，国际冲突往往起源于全球文化差异化现实中某些企图实现同一化甚至同质化进程的力量。不同文明之间相互理解，实现合作共赢是避免冲突的唯一正确选择。

莱布尼茨差异与和谐思想对文明交流互鉴的启发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不同文明间通过交流互鉴而互相促进的论断，就是中华文化“和而不同”主张的当代延续和发展。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不论是中华文明，还是世界上存在的其他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不仅肯定了文明差异存在的合法性，而且肯定了它的积极功能。

不同国家因其自然环境、历史传统和发展阶段而形成独特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关乎内部整合和对外影响，具有历史性和阶级性，因此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同时，为满足内部整合需求，意识形态也展现出民族性特征，这更多体现为样态差异。面对文明差异，西方有人试图用“普世价值”消除差异，但这些价值往往源于西方特定条件。中国则主张“和而不同”，平等对待不同文明，强调交流互鉴。西方文化中也有认同中华文明观的例子，例如近代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欣赏并理解中华文明，承认文明差异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当代某些西方人不承认文明差异性，若他们能从莱布尼茨哲学中汲取智慧，将更容易理解中国“和而不同”的交往原则。

本文基于莱布尼茨的观点，谈谈对不同文明

之间如何相处的想法。莱布尼茨对他那个时代传入欧洲的中国哲学思想持比较欣赏的态度，主张中欧文化相互交流，他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也明显丰富了其思想。尽管已经过去三百多年，但从莱布尼茨对中国哲学思想的理解，我们仍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作为基督教教徒的莱布尼茨认为，上帝基于无限多可能的世界进行创造活动，每一个可能世界都包含无限多的存在物且可以共存，这种和谐共存能体现上帝的伟大。在莱布尼茨看来：“存在或许可定义为和更多的事物相一致的东西，而不是与自身存在不相容的东西。”由此，他规定了存在的共性。与此同时，他又认为：“存在是具有存在物或可能性的东西和某种更多的东西。”由此，他断定：“……存在是与大多数事物相一致的存在物，或者是最大可能的存在物，因而一切共存的事物都是同样可能的。”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所有东西，都有其不容否定的存在价值，否则就是否定上帝的伟大。差异性也许是世界最显著的统一性。

莱布尼茨进而提出了关于事物的“差异律”，认为自然根本不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事物。在莱布尼茨看来，事物的特异性和多样性是由构成它们的单子的质的差别所塑造的，确切地说是由单子不同等级的知觉程度所造成的。单子在追求无限的过程中，就必然构成无限的差异性。莱布尼茨的观点，给事物的差异、人的个性、文明之间的差别留下了存在论的根据。实际上，每个文明都有其独特的性质，即使同属于欧洲基督教文明，英、法、德、意、俄等各个国家都有相互区别的某些特征，当然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基于起源和地理上的原因，可能小于与亚非国家之间的差异性。

莱布尼茨还主张世界在造物主那里就已经是预定和谐的。单子之间尽管无法形成联系，但自然万物是存在连续性的，每一个单子都以自己的方式表现整个世界。他指出，“自然从来不飞跃”。他还说：“每一个单纯实体具有表现其他一切事物的关系，并且使它因而成为宇宙的一面永恒的活的镜子。”莱布尼茨的这些观点，已经为当代复杂

科学所证实。承认人们之间元认知的差异性，实际上也就必须承认不同文明之间认知范畴的差异性；但是这种差异性却是在共同的人类实践所决定的共同前提下产生的，它反而是有利于构建社会的有机性。在这里，莱布尼茨也为文明之间平等交流互鉴提供了论证。

从莱布尼茨的哲学观点去审视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我们从中可以得到许多启示。文明之间的差异不是问题，不仅不是必须排除的消极现象，而且是富有生成性的积极能动性力量。实际上，莱布尼茨关于差异性的观点，无非对客观世界自身差异化存在的哲学表达，将它运用到人类文明关系中更能够体现其文化价值。

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原则性理解

基于上述论证，我们可以提出某些原则性理解。这些原则性理解，对于解决文明之间的冲突，理解当代人类文明未来前景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所有的文化集体都应该尊重不同文明的差异性，而且确认每一种差异化文明的存在理由或根据，这是文明间共生共存之道。在自然界，具体事务是真正存在的，以“种”“属”形态出现的存在往往是概念或是抽象的表达。在人类中，每一个体都具有独特的生存价值和生命意义，而社会共同体则是根据不同的划分进行的抽象表达。沃勒斯坦认为：“我们只有把世界看作是由历史社会体系所构成，才能把握社会现实。这些历史社会体系本质上是独立发展、自成一体的实体，而且有自己的运行规律，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生命体。”尊重不同文明的自有传统和独特性，也会让我们有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

其次，不同文明之间可以相互理解，保持和谐相处的关系，这是文明之间的交往之道。差异性连续性的前提，连续性又成就了不同的差异性。差异性文明间交流互鉴的前提，连续性让交流互鉴成为可能。在经济全球化产业链的合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体会到莱布尼茨对事物连续性和差异性的深刻理解；截断这种基于差异性的连续性（即产业链），就必然影响经济发展，导致《2024年慕尼黑安全报告》主题词所说的结果，即“双输”。这种理解在处理国际关系时非常有益，且与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契合。《中庸》就讲究人应该道法自然，像自然界对万事万物的包容那样，容纳差异性。现实中，文明的差异与多样性不一定

是消极的，反而是非常积极、能动的生成性力量。

最后，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文明间的相互促进的发展繁荣之道。莱布尼茨在与传教士白晋（1656—1730）的通信中，了解到《周易》的八卦系统，并且将“阴”与“阳”的演进系统理解成为他的“二进制”的中国版本。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中指出：“或许天意注定这样安排，因而当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和相隔距离最远的民族向彼此伸出手臂时，二者之间所有民族都会被引入某种更好的生活方式。”实际上，中国先哲早就认识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的道理。而现代科学的复杂性研究否定了丛林原则的可行性。“近年来的研究展现了进化更微妙的方面：合作与竞争必须共同作用。……真正有用的是竞争和结合。”实际上，在莱布尼茨之后，18世纪的启蒙学者也曾经“满怀深情地注视着中国文明，探讨它错综复杂的社会和精美优雅的文化”，这种欣赏式的关注“为后人开辟一条更为宽广的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新路”。与之相反，中国当时的闭关自守却导致了近代中国的沉沦与落伍。这是中华民族应该谨记的切肤之痛。

但是，莱布尼茨的思想是其所处时代的产物，仍然是在神学思想的控制之下阐释某些新思想。事物之间的连续性和差异性事物在时空体系下展开的必然结果，是事物自身矛盾运动的产物。可是，莱布尼茨将其解释为上帝创造世界时候的“预定和谐”。另外，不同认知主体之间的相互认识与沟通，这本来是主体之间互动的结果，可是莱布尼茨却将其解释为单子之间神创的外部一致。显然，这是莱布尼茨思想中的神学遗迹。

在差异与和谐中促进人类文明发展

在日益复杂化的当代世界，差异化也许更适合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譬如，一方面，世界各国面临不同的自然环境、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不可能整齐划一；另一方面，要解决全球性问题就需要方方面面的合作，而合作成功的前提是参与方都得到充分尊重。只有大家都愿意参与全球集体行动，才能达到莱布尼茨所说的“预定和谐”的效果。

实际上，莱布尼茨所处的德国，在西方文化中就是比较注重特殊性的，德国文化中也比较强调文化个性和民族传统的特性。德语中的“Volk”

一词，实际上就包含具有内在差异性的意蕴。每个国家的存在都是特殊的，必定有特殊的自我感。“没有这个自我感，没有这个对国家特殊性的敏锐感受，就不可能产生出政治原则。”那些来过中国的西方同行，对真实的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和中国人的认识也会有所改变，而不只是受西方模式化了的媒体观点的影响。有些人总认为自己是“是”，他者是“非”；自己是“普遍性”，而他者是“特殊性”。实际上，这种看法本身就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非”，其自身就属于身陷偏执之中的“特殊性”。

面对差异，各方都应该放弃文明优越感，实事求是地承认不同文明间的差异，认可对方文明价值观的特殊性现实。唯有如此，才能建立坦诚交流的前提。在一个越来越相互依存的世界中，除了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增进交流沟通、争取合作共赢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任何一方，都不应该有文明上的优越感，而应该通过对话找到和谐共处的路径，通过合作促进各自的繁荣发展。

在当代，与主张“和而不同”理念的中国人相比，西方人似乎更强调普遍性、一致性。我觉得，这一方面是因为西方近代以来几百年的强势崛起，习惯于在文化上的支配性地位；另一方面是西方人受其一神教宗教文化的影响。正如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前文化参赞梅卓琳所说的，当中国人“强调中国是不同的、独特的。这让我们感到震惊。我们害怕不同，所以害怕中国”。梅卓琳的评论充分反映了西方文化的基本心理定势：文明价值的所谓“普遍性”以西方文化为准，与之不同就等于是另类或怪异的特殊性。

实际上，世界是有差异的存在，也是有历史性差异的存在。不仅如此，创新和发展都是通过追求差异而实现的，西方进入现代性就是通过对人的个性的追求和张扬而展开的。但令人奇怪的是，西方人执拗于每个人自己的特殊性，却自认为西方的文化是普遍的，也许这正是其问题频现的原因之一。

另外，我们提倡尊重文明之间的差异性，但并不是否定普遍性，而是认为普遍性是从所有特殊性中抽象出来的共同性。因此，我们所讲的“特色”不是囿于自身的特殊性中而无法自拔，反而是立足特殊性而追求超越时空的全人类共同的善。一方面，文明强调交流互鉴本身就是认可文明间的共同性，这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开放包容始终是

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另一方面，我们主张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普遍性这一立场的明证。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白皮书所说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把人类历史长河中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弘扬起来，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价值共识，汲取世界多元文明相融相通优秀成果，反映了全人类的普遍愿望和共同心声。”

最后，我们可以设想，西方在历史上曾经有过摆脱宗教神圣一致性的思想解放活动，并且开启了追求个性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从而让西方文化获得了近现代以来的强势崛起。由此看来，追求国际社会不同文明体相互尊重且保持和而不同包容性的中国，也就具有了世界性崛起的文化力量。中国目前的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就是证明。一个愿意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谐共生的国家才能够赢得国际尊重，而一个总是希望维持自己优越地位而对其他文明采取支配性政策和态度的国家，不可能获得世界的认同。

需要指出的是，有可能西方国家所担忧的不是中国的特殊性，而是对中国迅速发展和崛起的前景的恐惧，因为这种前景会削弱西方所谓“普遍性”主张的合理性。我倒觉得，中国的发展并不会压制其他文明的光彩，反而会给各种文明的发展进步创造条件。这是因为，中国的文明实践和文化规范都体现了和而不同的差异性原则。首先，中国相信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互惠性。所谓互惠性就是，每个文明都可以在与其他文明的平等交流中汲取对自己有益的营养，从而丰富自己的文明内涵。其次，中国相信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生成性。所谓生成性就是，文明的融合可以形成更大范围的文明。最后，中国相信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超越性。所谓超越性就是，文明交流塑造了文明发展的跃升。面对差异性、特殊性和多样性，莱布尼茨说的“预定和谐”须靠上帝的存在来保障；但对于中国文化而言，和谐不是事先预定的，“和而不同”是人们合力追求的结果，也就是人类交往活动的产物。由此看来，中国的发展拉开了人类文明崭新形态的序幕。§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思维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教授；摘自《哲学研究》2024年第7期〕